

中共满洲省委时期

回忆录选编

第三册

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

编 辑 说 明

为了研究东北地方党史的需要和提供有关人员在中共满洲省委时期活动的情况，我们编辑了《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一、二、三册），做为所藏资料。

本选编所收集的一百篇回忆文章，是当年战斗在东北各地的老同志，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撰写的。它是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英勇斗争的真实记录；是研究满洲省委时期地方党史的珍贵资料。文章的顺序，按老同志在满洲省委时期活动的先后时间排列。我们对所选用的回忆录，除标点、文字和个别段落，稍加修订外，基本上保持了原来面貌。

对于选用的回忆录，我们组织人员对健在的大部分老同志进行了回访。老同志对以前写的回忆录作了修改、订正和补充。

由于老同志经历不同，对某些历史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是客观的。即使本人的回忆，由于时间久远和各个历史时期所处情况不同，写出的回忆录也不尽一致。对此，我们都给予保留，以供同志们在研究时参考。

本《选编》除地方党史所直接搜集的资料之外，承蒙有关单位提供大量资料，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参加《选编》编辑工作的有：张广恩、王子文、安振泰、施玉春等同志。

本《选编》仅供内部研究，不宜外传，不许翻印。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和时间仓促，编辑工作中肯定会有许多不当之处。请老同志和党史工作者不吝批评、指正。

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

一九八五年三月

三 册 目 录

冯仲云:

回忆金伯阳和大连党组织部分情况	1
“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党的活动概况	5
满洲省委及“北方会议”、“二六”指示信等情况	8
回忆李兆麟将军	11
回忆张述同志	12

薛 雯:

回忆金伯阳同志	13
在东北三省征集会上的发言	14

何成湘:

一九三〇年——一九三四年中共满洲省委、 奉天特委的活动情况	19
对金伯阳同志的回忆	23
满洲省委贯彻“北方会议”及“一、二六”指示信等情况	26
对抚顺特支的回忆	28

何能:

对东北地下党、团的活动情况	30
---------------------	----

李实：

中共满洲省委活动情况（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	33
“九、一八”事变前后党在东北领导革命运动的回忆	47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九三三年九月满洲省委组织状况及 路线、指示、会议等问题	78

李范五：

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六年）	108
------------------------	-----

杨光华：

回忆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中共满洲省委的情况	175
康生在三十年代制造的大冤案	180
满洲省委的组织状况、去共产国际的经过和对“王康指示信” 的一点看法	211
在东北三省征集会上的发言	221
撤销满洲省委前后	232
我对撤销满洲省委、另成立四个省委的看法	243

回忆金伯阳和大连党组织部分情况

冯 仲 云

我对金伯阳同志的事迹知道的不多。

一九三〇年党组织派我去东北，到满洲省委秘书处工作（我是这时由关内到东北的）。实际这个时期我没有做多少党的工作，当了一个时期大学教授，兼做党的工作。到一九三二年初专门做党的工作了。我记得伯阳做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会工作。哈尔滨赤色工会是伯阳同志组织起来的。那时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启发阶级觉悟，给将来的政治斗争打基础。这个工会到底通过哪些工作建立起来的我不清楚。不过这个工会也是处于地下，不能公开，这一点是肯定的。

一九三二年初伯阳同志是满洲省委委员并兼执行委员（据薛雯同志说伯阳是工会书记），工作很好，很勇敢，给同志们的印象很好。

一九三二年秋天，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已牺牲）派伯阳同志去苏联开会，地址是海参崴。这个会是由共产国际太平洋职工秘书处召开的，研究工运斗争问题。伯阳共去两、三个月时间。那时去苏联是偷越国境线，是困难的。我想他是在一九三三年春季回来的，同时带回中央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抗日武装执行民主统一战线指示信，向省委做了汇报。在我家召开的省委会，地址在哈尔滨协和街。这个指示信

还有，不过时间久了，烂掉一部分，在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放的。

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前，伯阳同志和其它省委负责同志一样没有什么职业，专做党的工作。二月以后哈尔滨市张某（大肚皮）创办一个日文补习学校，省委借机派伯阳同志到该校当日文教员，为职业掩护，更便于工作。听说伯阳学过日本话，也很胜任这个工作。干了一个时期，大肚皮家的小姐，看好了伯阳，伯阳也有意同这个女子搞恋爱。这个女人好出风头，长的也很漂亮，大家都叫她“一枝花”。伯阳是大个儿、大眼睛，也十分英俊。他俩相互均有爱情，后来这个女人经常写个“爱”字夹在伯阳的教科书里。这时省委已知道了这件事，恋爱省委同意，不过这个有钱家的小姐爱上了革命干部，会不会是敌人搞的什么名堂。组织对这一点有怀疑，经过调查这个女人不知道伯阳是党员，于是省委找伯阳谈了这个事，伯阳同志很听党的话，也很能克制自己，决定和这个女人断交。一九三三年六月杨靖宇同志回省委汇报工作，说盘石等地革命游击队里面工作也较繁乱。省委决定派伯阳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去盘石等地巡视工作。伯阳走后，这个张家小姐到处找他，因为伯阳走时没有告诉她。这个女人有个未婚夫，姓孟，是满洲里市长。她为了找伯阳就和这个伪市长断绝关系了。但后来她怎样也找不到伯阳，就自杀了。她自杀后，哈尔滨各报大登特登这一消息，除省委几个人外，其它人都不知底细。

一九三三年九、十月间，伯阳到了盘石。这时日本侵略军十分猖

狂，大举进攻和围剿游击队。因情况紧张，伯阳也参加了战斗，在战斗中负重伤（不是当时牺牲就是负伤不长时间牺牲了）。杨靖宇把伯阳同志牺牲的经过写成材料报告了省委。这份材料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后我就没有见过它，这份材料不好找啦。杨靖宇和伯阳很熟，靖宇曾任过哈尔滨特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北满）兼省委委员。伯阳是省委委员搞工会工作，相互有着工作联系，关系也较好。

大连还有个同志，是过去的印刷工会的，名叫魏长奎，曾在一九三一年任过北满特委（即哈尔滨）组织部长及特委书记。在一九三二年被日寇捕捉入狱，押了六、七年。在一九三八年出狱后，省委派他去抗联救国军任政治部主任。在松江南岸游击战争中中弹牺牲，这个同志也很好。

大连在一九二五年就有党的组织，但屡遭敌人破坏。因为日本鬼子控制较严不得伸张，一活动就被发觉，所以省委对大连也是特殊看待。后来在一九三三年大连又改为特支，党组织又发展起来了。从山东过来不少同志，有个姓安的担任书记，不久也被破坏了。满洲省委在一九三四年被破坏的很惨，共捕了两千多名，判死刑八十多名，无期徒刑二百多名，其余都是徒刑。你们想搜集这些材料可到大连公安局去查。因为鬼子捉到共产党要登报的，旅大解放较早，解放时，韩光和欧阳书记就去接收了，大约不会被毁坏的。

伯阳同志何时怎样参加了地下党的活动和怎样与党接上头的我不

知道。如果伯阳同志肯定在二七年下半年因鬼子捕捉被迫离开大连，那说明，不一定省委没有成立就不能参加党的活动。二七年沈阳就有地委吗！你们再查一查伯阳是否是由过去的大连党组织派去工作的，如果没有人介绍，那么和党组织接头是很困难的。

我听说在一九三〇年以前（我去之前）刘少奇同志曾经组织和领导过满洲省委工作，也有可能因大连工作困难而去过大连。据我知道，了解一九三〇年前东北党的情况的人不多，除了少奇同志，还有杨一辰同志。杨一辰同志大约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在满洲省委工作过。他对伯阳同志的事迹和伯阳什么时候入党等一些情况可能了解的多一些。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

大连机车车辆厂整理

“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党的活动概况

冯 仲 云

“九一八”事变时，党的力量很弱。我们党在那时候往往要克服很多困难，很艰苦的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到部队去组织，展开抗日武装斗争。共产党在东北很早就进行着自己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我们党很多老同志，是在东北作了很多工作的，例如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二八年左右就做过满洲省委书记。党在艰苦的地下工作中发展了自己的组织，密切了和群众的关系。那个时候，东北党内的中国同志，主要集中在大连、抚顺、沈阳、台安、辽中、锦州以及南满的长春、吉林、哈尔滨、安东和齐齐哈尔等城市、矿山。而且党的组织大都集中在工厂的工人、学校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之中。一九三〇年以后，由于“立三”“左”倾路线的错误，使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也不断的遭到破坏，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不能迅速的开展。一九三三年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会议，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指导下，提出“反对北方落后论”主张“创造苏维埃红军”。这个过“左”的口号，对于民族斗争正在高涨的东北产生了影响，当时党派了很多党员创造根据地，在组织红军、创造游击队中是有成绩的。但由于过“左”的口号，没有估计群众要求起来组织武装抗日统一战线，不适时的提出

了组织苏维埃红军，也阻碍了党领导下武装抗日部队的发展。当时东北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游击队，第三十四军游击队和第三十六军游击队。但是我们的工作到处碰钉子，到处挨打。我们游击队的敌人，不但有日伪军，还有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和农民原始武装。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央的指示信来到以后，东北的错误路线才改变过来……。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央的指示信使东北党在路线上起了巨大的转变。东北党根据中央这个指示，还召开大会贯彻指示。这个指示原文现在我不知道了，没有了，只有日文译本，内容大体上说：当时的东北部队分成四种，(1)旧军队，(2)王德林部队（群众起来组成的），(3)红枪会，(4)红色游击队。同时指示我们赤色游击队应对以上三种游击队以不同方针对待之，缔结共同抗日的协定，联合作战。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反日游击队。并且指出，反日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就这样我们便决定取消东北红军的番号，开始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直到一九三五年东北人民革命军才改为东北抗日联军。但东北的老百姓当时以及到现在为止的记忆中还称为红军或抗日军。

东北党的组织路线就是如上所述，开始是抗日的游行示威，而后又发展到民族战争，苏维埃红军，而后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东北的地下党工作是有相当的力量，起初省委设在沈阳，后来

到哈尔滨。但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破坏。如在哈尔滨，一九三四年的大破坏，和最有名的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的大破坏，都给党带来了许多重大的损失。当时我们的组织是一条线串下来的，并且还经常组织什么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等，所以日本侵略者一抓就是很多。一九三七年的血案，仅在报纸上公开登载，就枪毙了共产党员八十多人，被捕的二千多人，判处徒刑的有四百多人。实际上死的、被捕的、枪毙的，还不止这个数字。当时地下工作之所以被破坏得干干净净，是因为第三次左倾路线指导的结果，以致使地方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光。后来我们的游击队来创造根据地，从部队上派遣干部，组织地下党。但在一九三八年松花江的地下党工作，又遭到大破坏。当初敌人到处搜查，除当场被杀死的以外，被敌人抓走的还很多。敌人这种穷凶极恶的烧杀，致使松花江两岸千里繁荣地带化为一片灰烬。

长春市委党校整理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满洲省委及北方会议、“一二六”

指示信等情况

冯仲云

罗章龙右派来东北时先到沈阳，由于沈阳没有多大作用，他们就到哈尔滨。这时中央派罗登贤、何成湘到东北来了。北满特委书记是山东李（侯志的爱人，实际他是姓吴叫吴富锦，），组织委员姓何。他们刚一来时没有关系先住下了，实际上当时有关系的都成了右派。由于代表右派的特委书记孟天飞是商船学校毕业的学生，所以他们以商船学校为核心吹起来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们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上也是有错误的。我们认为如日本占领了沈阳之后再往北进攻，苏联就能出兵。当时我们也提不出什么口号，组织上也没有许多的力量。

后来罗登贤同志来了，他就住在我家里，曾在我家开过会。这个同志是工人出身，很好。后来由于张光贤（胖子）叛变，省委两次被破坏。罗登贤同志到哈尔滨来一趟，回忆大概一月时把省委搬到哈尔滨来了。当时党的经费主要依靠我和另外一个同志的薪水，我挣二百六十元钱，要拿一百八十元作党的活动经费用。

一九三二年北方会议批判了“北方落后论”，要在东北搞苏维埃

和红军。这个口号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还没有改变“左”倾那一套。

北方会议就是教条主义，不看客观形势。在当时反日是主要任务，但却没提出反日的口号。所以提出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在东北当时情况下是不对的。北方会议以后，大家都下去在乡下组织苏维埃。组织红军，根本就没组织起来。但是当时组织部队这是对的。抗联这个名称是后来起的，原来并不叫抗联，当时是叫红军或抗日军。别的名称都不是当时的，而是解放以后叫出来的。北方五省会议实际上也是不合法的。

一九三二年以后，中央认为罗登贤同志能力弱，把他调走了。他到沈阳又作了一些工作，并出了一次危险，逃出后回上海去做工会工作了。后来由于叛徒出卖而牺牲了。罗登贤同志走以后，李实接任省委书记，半年多点他就走了。

北方会议提出举行游行示威，省委还写了“八一”决议。当时我和尚钺与何成湘的意见不一致，我们主张光示威游行还不够，还应当搞部队。由于这种争论，决定要给我们处分，叫我们写申明书，尚钺写了几点，写的不好，所以给他处分。后来王一飞来找我，叫我去作国际工作，想把我拉过去，我没去。我又告诉了尚钺，后来他去了。但他没经过组织允许就去了，我把这个情况向省委报告了，因此只给我严重警告处分，尚钺被开除了党籍。

一九三三年又决定回到哈尔滨，这时“一二六”指示信已经来了。

这个指示信中只有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大会决议的几句话。“一二六”指示信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一它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问题，分了四条，如上层统一战线，下层统一战线等。这里虽然也有问题，但究竟是提出了统一战线。第二它提出了健全赤色游击队的问题。这在原则上也是对的。第三它处处没忘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此，“一二六”指示信在基本原则上是正确的。它是共产国际起草的，王明他们虽然也参加了意见，但主要还是共产国际。当然它不一定完全正确，有教条主义，也有“左”倾。同时它又都是一些原则，没有东北的具体情况。它比王康指示信较正确，但不灵活，很不具体。

黑龙江省党史所整理

一九六〇年三月八日

回忆李兆麟将军

冯仲云

李兆麟是辽宁人，原名李烈生。他父亲是个警察官，有个日本小老婆，小老婆死后闹了一场官司，李兆麟小时候就参加打官司。他父亲死后，他在家呆一段时间后，到北京去念书。“九一八”事变，学校学生都起来了，他参加了反帝会，奔走于反帝工作，到了耿继周处，当义勇军，在锦州、黑山一带活动。人家也看不起他，弄的很危险。后来这支义勇军垮了，他跟报字“燕子”的义勇军在一起，这个队伍后来投降了。李兆麟进了沈阳，开始受河北省委领导，河北省委派夏尚志到辽宁做领导工作，对此满洲省委有意见（夏尚志于一九三五、三六、三七年在哈尔滨做过市委书记），河北省委才把夏尚志、李兆麟的关系交过来。这时李兆麟的母亲，爱人都在沈阳住着。李兆麟来做红袖头工作，险些被捕，改名张玉华。我在哈尔滨同泰棧和李接的关系，他老婆也坐监了，后放回了沈阳。那时红袖头的工作做的还挺好，张恭的被破坏就是红袖头工作而暴露的。

回忆张适同志

冯仲云

张适同志一九三二年以前在呼海铁路（呼兰到海伦，现为哈尔滨铁路，哈尔滨——北安）四方台附近教书。他酷爱文艺，借文艺与当时铁路职员结识，如胡起（现牡丹江铁路局局长），罗烽等组织团体，进行革命工作（张适可能在此以前就是共产党员）。一九三二年呼海路上发展了组织，张适调到哈尔滨工作，任哈尔滨市的区委书记，可能也任过市委书记，在满洲党内很有名的黑张就是他。一九三三年我到吉林，他正在吉林市任省委巡视员，检查和领导工作。在哈市和吉林黑张的情况现任鞍山市市长李维民同志可能知道。一九三三年夏后，他到沈阳担任沈阳市委书记（也可能是奉天特委书记）几个月后被捕入狱。在狱中（用张功这个名字）备受敌人严刑，顽强不屈，敌人也无可奈何（当时在党内曾流传他顽强不屈，英勇斗争的故事），后被判刑十二年。他的被捕及狱中斗争情况杨一辰（原中央商业部部长，现青海商业厅厅长）同志知道。黑龙江省整理旧档案中亦整理了张功的案件，档案也证明张适同志是顽强斗争的。由于日皇生子而得早期释放后，回到齐齐哈尔、甘南一带打算找抗联部队没有找到（这是他儿子来信中谈到的）。“八、一五”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他到哈尔滨